

■ 中国边疆学——一门年轻又古老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着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的演进历程作为基础；说它年轻，是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马大正等一批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倡导建立中国边疆学起，至今不到40年。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中国边疆研究从未止步，不断取得新突破。如今，中国边疆研究硕果累累，中国边疆学科建设持续深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本期讲坛邀请中国边疆学专家马大正先生回顾中国边疆学从酝酿到建立的探索过程及思考。

——编者的话



▲马大正

行进中的中国边疆学探索之路

酝酿构筑中国边疆学

早在1987年酝酿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简称“边疆中心”，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之时，就产生了人们习惯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边政学……为什么中国边疆研究不能发展成一门中国边疆学的思考。随着边疆中心提出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统的推动和展开，特别是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深化，深感仅仅依托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够的，需要有多学科的介入，而我们理想中的中国边疆学就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1990年前后，边疆中心在设计重大研究课题时即提出拟启动由边疆中心研究人员主持的四大课题：一是《中国古代疆域史》，主持人为林荣贵(研究部主任)；二是《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主持人为吕一燃(边疆中心主任)；三是《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主持人为马大正(边疆中心副主任)；四是《中国边疆学概论》，主持人邢玉林(编辑部主任)。

经过努力，四个课题先后列入社科基金项目，其中前三项先后完成并

出版了专著，《中国边疆学概论》项目主持人邢玉林也撰写了论述中国边疆学的论文《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和《关于中国边疆的若干问题》等，对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进行了专论，成为最早较为系统论述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专论而引起学界关注。可惜此项目因未能按时结项而最终撤项，《中国边疆学概论》只存书名而未能成书。

1994年2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抓住我国边疆事业发展的机遇，为开创中国边疆研究事业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的大会发言中，正式提出：“中国边疆学是一门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新兴学科，我院应充分重视这一学科，使之有可能在这一学科发展中取得优势。”及至1997年，我在拙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一书结尾处写下如此心语：

“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中国边疆学构筑这一命题，始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

三秩之功，中国边疆研究新突破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策划始于1990年，而《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则完成于2019年，两者间差一年就是30个年头，中国边疆研究始终是我关注并持续研究的项目。

(一) 历时七年，《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得以完成

中国边疆研究史是边疆中心调整后着力推荐的三大研究系列之一。1990年我在主编并完成《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等三本书后，即着手策划“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项目的论证和启动。

1990年10月，课题以《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史》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很快，课题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证评审组评议批准资助，资金是2.5万元，在1990年这一资助力度还是相当大的了。

我是课题主持人，最初确定课题组成员是林荣贵和刘迅，后因边疆中心决定林荣贵主持中国古代疆域史项目，我们课题实际是我和刘迅负责撰写工作。原定设计的计划是1992年6月确定大纲和执笔人马大正、刘迅的分工，1993年年底完成初稿，1994年交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作为“边疆史地丛书”选题之一出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两个没估计到：

一是资料收集，特别是20世纪20—40年代有关边疆研究资料实在是浩如烟海，单以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名目繁多的期刊就让人眼花缭乱，且数量巨大，收藏又十分分散。

二是随着边疆中心开放性研究工作的开展，业务组织的工作量剧增，身兼副主任职务的我，深陷“双肩挑”之重压，要静下心来查阅资料思考问题太难了。

尽管资料查阅一直在继续，思考也未停止，但落实写作计划还是搁置了近两年。1994年8月9日，我将原先拟好的大纲框架重新整理，提出绪论、综论、分论、余论四大板块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在余论中，对未来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前景，我们作了探索性的建议——要创立中国边疆学。

1995年撰写书稿成了我和刘迅的主要工作之一，得益于研究思路一致、合作关系和谐，进程颇为顺利。在我的工作日记中有这么一则：1996年1月24日，讨论书稿。意味此时书稿已经完成，并将书名修改为《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

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为本书所撰出版推荐意见书中指出：“从此书的内容来看，它包含了对中国边疆研究史和中国边疆学概要这两个基本方面的论述。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史是此书的基本内容；书中展示了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划分了发展阶段以及若干学术体系和派别；分析了研究发展的背景、动力和特点；分类详述了中国边疆研究六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家观点和成果；最终作出了作者对近百年

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历程的评估。而中国边疆学概要则是此书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分散在书中综论和分论部分的相关内容外，作者还用了相当笔墨写了绪论和余论两个部分，较集中地对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与诠释，这包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对象、方法、研究者、历史遗产、学科价值和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前途，以及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等等”。“此书的高水平首先表现为该书是在中国边疆研究这一重要领域取得了较前人明显的进步，这是从分散、模糊、盲目到开始走向集中、清晰、自觉的进步，这是建立了一个很好开端的进步。此书的高水平其次表现为作者较好地把握了‘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和‘一门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这两个主题有机组合起来，也就是较好地将对理论研究成果研究和对中国边疆研究论题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也就体现出此书的广度和深度。此书的高水平其三表现为作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具有创见性且有深度的论述，此书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在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新问题的基础上尝试解决新问题。”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已过去近30年，回望当年的学术思考与学术写作实践，可归入成功经验者有：

一是本书提出的学术主张，诸如近代以来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划分，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边疆研究高潮兴起的准备，20世纪下半叶台湾学者的中国边疆研究——边政研究的持续与嬗变，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边疆研究新的起步等，其学术内涵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在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中曾起到启迪的引领作用。

二是首次向全社会提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大命题，当年我们对中国边疆学的定位是“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

三是学术写作实践的成功，为新世纪大型综合性边疆研究项目实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经验。

(二) 同样历时七年，完成《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两个版本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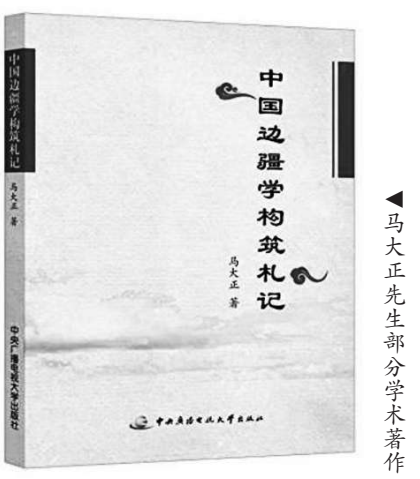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2012年酝酿，2015年完成，2016年出版；《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2018年秋动笔，2019年完成并出版。前一册60余万字，后一册近80万字，历时也是七年。2012年至2019年，我的年龄从古稀(74岁)进入了耄耋(81岁)。

大约在2012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沂同志参加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一次出版项目专家评审会，会后谈话间沂同志向我约写《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此题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史”大系列丛书“当代中国学术史”系列中选题之一。此提议于我确实很有吸引力。2013年2月，我提交了草拟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2)》大纲和撰写计划(成书稿后时间有限延到了2014年)。但真正启动已到了2014年春节后，缓缓地爬格直到2015年4月完成了全书的通稿。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自2016年6月出版以来，承业界和关心边疆研究广大读者垂爱，颇受关注，颇获好评。一些高校将本书指定为涉边疆方向的硕博研究生必读参考书。

2018年夏，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韩志燕博士告之计划再版的通知，并希望：一是将所述年限从2014年延伸至2019年；二是最近2019年2月完成修订交出版社。2019年12月，《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正式面世，我在本书第四篇展论中分“上、下”两专题阐述了对中国边疆学构筑探索的思考。

学界同仁对两个版本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多有评议。如李大龙、张振利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新突破——〈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读后》中指出：“该书以中国边疆为切入点，以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和30年创新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程为线索，从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等角度构建了点、线、面、体有机结合的中国边疆学体系，多



▲马大正先生部分学术著作

中国边疆学之思仍在继续

承载着千年传统、百年积累和40年探索的中国边疆研究，今日面临着新的跨越——构筑中国边疆学，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一个边疆研究工作应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迎接挑战。

2013年至2015年，我在构思、写作、校读《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一书过程中，日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有关中国边疆学构筑命题的提出，最初产生于对中国边疆研究史的考察和对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深化，而中国边疆学构筑从提出到思考的不断深化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进程。既然个人无力完成，姑且命题为《中国边疆学通论》的写作，将历年撰写的记录自己渐进、持续思考进程的有关论文、札记和访谈汇集，选编成册，似是一个合理合适的选择方案。

这就是《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成集出版的缘起。

《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写于1991年至2016年的15篇有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论文中选了7篇，主题是中国疆域的形成、发展和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下篇，从写于1997年至2016年的20篇有关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札记中选了14篇，主题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思考。

本书从选编成集到校读完成大体用了两个月时间，这本近30万字的“札记”，2016年12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的“后记”中，我抒写了编选、诵读旧文后的新感悟：

在中国边疆学构筑学术进程中，我“深以之为如下几个节点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对中国边疆研究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的继承，以及30年创新的实践，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准备；二是对中国疆域理论的不探究，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科基础；三是对中国古今边政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多层而研究，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有效切入口；四是当代鲜活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原动力。”

2021年初春，我在重新选编五卷本“马大正边疆文存”时，决定将原计划第一卷《中国边疆学演进叙论》(实是《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第一、二、四篇的缩写本)改为《中国边疆学构筑论衡》。

《中国边疆学构筑论衡》是在《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和《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两书，以及2019—

角度、全方位、鸟瞰立体呈现了中国边疆学的厚度、深度、广度及高度，对中国边疆学构筑具有突破性意义。”

张宇龙在《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石——读马大正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认为，本书“对正在构建中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张昊鹏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基础工程——〈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出版纪实》中表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从书中“有对学科创建具有创新性开拓意义的著作，如《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这是新时期我国第一部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认识中国边疆研究的权威著作……从西北史地学，到边政学，再到中国边疆学；千年积淀，百年探索，三十年创新；因问题而研究，因研究而成学术，因学术而自成‘学科’之言；‘中国边疆学’的历程说明，一个学科不是从来就有的，学科体系的构建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成。”

主讲人简介：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首席专家、专家委员会主任等。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边政政策、中国边疆研究史、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国边疆学理论框架的构筑等。出版《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中国边疆经略史》等著作5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权威文摘转载；学术成果先后获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工程”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多项奖励。

路漫漫兮，任重而道远

在几代学人不懈努力下，中国边疆学科建设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近年来围绕中国边疆学所开展的互动交流、学术讨论十分热烈，相关研究成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构建“中国边疆学”已经从“呼声”转化为学科建设的探研实践，成为边疆研究学术界的共同目标和任务，虽路漫漫兮，但中国边疆学前行的步伐却是行稳致远。

(一) 不忘初心，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边疆学是一门全方位研究中国边疆极具中国特色的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就是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我们应该立足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实际，从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和复杂丰富的现象中，梳理和总结出中国边疆研究的一般性、规律性和突出特点，建构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边疆学就是研究中国边疆从历史到现实所有问题的综合性学科，我们在借鉴西方学界相关理论时，一定不要忘记中国特色的实际。

总之，一句话，不忘初心，就是不能忘记中国边疆的实际，不能忘记我们提出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初心即是为了解决中国边疆面临问题，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

(二) 中国边疆学演进历程中的五个节点

中国边疆学从提出到思考的不断深化，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进程，在这个颇显漫长的进程中，在以往我提出四个节点的认识上，我深感如下五个节点不容忽视，都应该成为我们深化研究的重中之重，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

一是对中国边疆研究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的继承，以及40年创新实践的总结，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准备。

二是对中国疆域理论不探究，是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的基础。

三是对中国古今边政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多维度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展开，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有效切入口。

四是当代鲜活的现实生活的紧迫要求，是推动中国边疆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五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凝聚，是中国边疆学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人才是第一资源，有着其他资源无法比拟的无限开发性、可创造性，要牢记古训：“千金易足，一土难求”，要懂得：懂人才是大学问，聚人才是大本事。

上述五个节点包含着丰富内涵，研究亟待深化，为此我呼吁学界同仁予以关注，以期推动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深化。

(三) 边疆学人的责任担当

中国边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化，是边疆学人的责任担当，我想表达如下建言：

1.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大战略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大命题是新时代边疆治理大战略的核心内容，值得边疆学人深刻领会和阐释。

我们应对“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疆”重要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以及对当代治理方略研究的普遍性作进行深入阐释和研究。而在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如下研究课题应予以特别关注：

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其中包括，“中华民族”一词的产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其政治、人文内涵演变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等。

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

“意识”的内涵与作用的理论研究，以及对怎样“铸牢”的对策性研究。

与此同时，还应该认真梳理中共几代领导集体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系统资料收集和整理。

2.“两大历史遗产”是历史认知的基点

当代中国人继承了先辈留下的“两大历史遗产”：一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一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当代中国人历史认知的基点。

对于“两大历史遗产”的形成及其重要性和战略地位，我觉得现在研究得远远不够。我们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疆域形成、发展、奠定及其历程和规律的研究，可以从点到面，正面谈我们的认识，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和发展，同样也需要把历程和规律讲清楚。

3. 中国边疆学学科理论的推研

诸如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亟待加强；中国边疆学学科定位亟待明确；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亟待整合。问题的深化探研，当是边疆学人的职责所在、历史担当。只是面对历史担当的重任，我想重申两点担忧。

第一，最重要的是，中国边疆学构筑、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全面展开，一定要防止边疆概念泛化倾向，千万不要忘了“中国”二字。不要脱离中国的实际，不要偏离中国边疆学的初心即是为了解决中国边疆面临问题，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二，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外语好，用西方的边界理论来套中国的边疆，越套越乱。中国的边疆是中国特色的，它不是民族国家成立以后现代意义的边界。如果用现代意义的边界来界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会越来越糊涂。

(四) 走出象牙塔，研究要直面现实、走向社会

塑造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中国边疆治理战略重大举措，边疆学人要走出象牙塔，在边疆教育的战略方向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塑造一代又一代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基本保证。

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基本要素是什么？我以为可用八个字来概括：爱国、守法、进取、自律。爱国是合格公民的底线，守法是合格公民的准则，进取是合格公民的自强自立基础，自律则是合格公民做人的本分。

塑造合格公民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动员社会各界各方面力量，在国家指导下有序推进全民教育中实施，而在多元文化共生的边疆地区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里所提的全民教育，应该是从娃娃起，社会各民族各个阶层全覆盖；教育则是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管齐下，缺一不可。在这些方面，边疆学人是大有可为的。

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历史是现实的昨天，未来则是现实的明天。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边疆，其本身即具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因此，中国边疆学研究必须依托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这既是中国边疆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边疆学科建设的需要。

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持续深化，需要学人扎实的研究、持之以恒的决心、锲而不舍的信心，一步一个脚印。即老子所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边疆学在中国这片学术沃土中已破土而出，必将成为中国学界中一棵参天大树。